

我在北大这四年

——一位北大毕业生的心路历程

迟宇宙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运生

封面设计：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 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北大这四年：一位北大毕业生的心路历程/迟宇宙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1

ISBN 7-5078-1641-9

I. 我… II. 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W.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428 号

我在北大这四年

——一位北大毕业生的心路历程

迟宇宙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66049514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本 11.25 印张 25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ISBN7-5078-1641-9/I·132 定价：17.00 元

前言：未名湖是个海洋

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它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被吸引住。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现在的北大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那校园说不上美。在战时，在昆明，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是相当的残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住你，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领着你的心。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谢冕先生的文章《一百年的青春》中的开篇。谢先生说得不错。北大就是一块这样的精神圣地，恐怕在当今中国，没有哪一片校园可以与北大相媲美了——我不是指校园风景是否美丽，而是指它对一个人思想和修养方面的影响。

北大的思想开放程度是整个中国最好的，北大的学术精神是整个中国最好的，北大的先生是整个中国最好的，北大的学生也是整个中国最好的。有了这些，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北大的辉煌？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北大人而深深地感到骄傲；也一直为自己即将离开北大而深深地体味到了别离的感伤。也许世界上的事情是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那么我追求最接近完美的那部分，隔着时间和空间，远远地眺望着北大。

北大的象征据说是未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其中以未名湖

最有代表性——它是一代人关于名实之争的副产品。在我们的心中，未名湖不是湖，而是一个海。其实，未名湖很小，简直可以算作一个池塘了，但是它是我们心灵的海洋。有个叫许秋汉的北大校园歌手曾经写了一首歌叫《未名湖是个海洋》，歌中唱道：

这真是一块圣地
今天我来到这里
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
它的面容在欢乐和哭泣

这真是一块圣地
梦中我来到这里
湖水、泪水、血水、汗水在闪烁
告诉我这里没有游戏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的梦，就在这里

还是谢冕先生在《一百年的青春》中写道：“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从京

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这水已经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将永远流下去，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我也与谢先生一样感到骄傲，但是，我就要离开了。离开自己所爱的那片土地就如同离开自己所爱的女人，是令人伤心的。离别的时候肯定是一副小儿女的姿态。也许，我在本书中的回忆、伤感和沉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在北大这四年》，原来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现在却作为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先出生了，就只好将小说变成一个并不遥远的期望。

当然，书名也有对我在北大四年的生活进行总结的意思。人是需要不断总结的，尤其是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又恰逢北大百年校庆。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为序要短，我在这里罗哩罗嗦地说了这么一大通，实在不好意思得很。

迟宇宙

1998年5月3日于北大

第一辑 北大啊北大

我在冬天坐下
我在冬天倒下
我从荆条的天空闪过
在一个喧嚣的年代
我是鲜艳的邪恶
我是飞翔的死亡
一粒幸福的鸟鸣声

我在冬天燃烧
我在冬天熄灭
那些苍白的地火
那些轻轻起舞的暧昧
掀起笨拙的格局
“我的前额是火
信仰是我的尸体”

——《燕园》

北大啊北大

○在我即将离开这片菁菁校园，与漂亮女生和白发先生挥别的时刻，突然又拥抱了一些被露珠打湿了的记忆。北大的先生和北大的象征，永远鲜活在我心中。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已将灵魂沉淀成了未名湖底一列不甚晶莹的砂石的自己竟然在写下这个题目后突然产生了喟叹的心情；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让我在即将离开这片菁菁校园，与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挥别的时刻，突然又拥抱了一些被露珠打湿了的记忆——事实上，很长时间了，从一个单纯的孩子开始，我就明白了往事这玩意儿是可以拿来卖钱的——小名人的卖小钱，中名人的卖中钱，大名人的卖大钱，无名人的没有价钱。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明确地对你说，这是一篇散文的题目，尽管它在语法结构上是戴厚英女士的成名作《人啊人》的翻版。好在戴女士死了（这说法有点儿残酷），不会像韩少功状告张颐武一样与我打官司。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北大究竟给我，给我的长辈、我的同代人、我的后来人带来了和即将带来什么？我们丢失在在北大的青春岁月究竟为我们换取了什么样子的未来？事实上，尽管我们时常挖苦、辱骂，甚至是诅咒她，我们依然明白——北大是我们永生永世的梦和图腾，就像大唐是诗人和知识分子的梦和图腾一样。

整整四年（实际上还不到，我透支了自己的感情和时间），北

大给了我快乐和苦难、幸福和灾难、奋发和艰难，但是我依然像个孩子一样热爱和尊敬着她。

她把我成就成了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

先生

先生这个词古时有六个意思：始生之子，犹今言头生；父兄；年长有学问的人；老师；文人学者自称；妻称丈夫（《辞源》）。在北大，先生则确切地表现为一种对老师和学者大儒的尊敬。实际上，对于先生的敬爱和迷信，使我们的时代在产生文化英雄的同时也产生了教皇的子民和人格的奴隶。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必然会有先生们披荆斩棘的文化砥砺，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拥有一个叫作“新纪元”的名词。

无论是在真正严峻的时代，还是在肉体和精神都慢慢丧失的世界里，北大从来都不缺乏先生。我没有机缘与宣扬“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的陈仲甫把酒临风，秀才造反；也没有机会与李守常一起“以身殉了他的主义”；更没有像鲁迅先生一样，举着投枪和匕首，扎向敌人的心脏。我不在这批“先知苦行者和精神烈士”的名单上。

对此，我感到很遗憾。

但是我有自己的先生，就像在一个克隆复制的年代里，北大保有自己的风格一样。

谢冕 1932年1月生，福州市人。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现代诗歌的理论、批评及研究工作。（北大中文系系刊《博雅》）

谢先生冕是我高中以来最为崇敬的一位（先锋）诗歌研究、评

论者，我曾经对朋友们说过：谢冕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同样的一句话，我也对谢先生说过，尽管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不再迷信权威；我依然对他景仰一如高山流水。

也许谢先生从他出生的那天起就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既要关联于时代，又要扮演一个开放社会的敌人的角色的命运。他渴望一种审美的自由。记得韩毓海在他的一本书中曾经这样写道：“谢先生尝谓：没有‘对话’的谈话是训话，没有诗意和生趣的真理是教条，他老人家以一双诗哲的慧眼看世界，处处皆为有我之境，在他的视野里，审美的阳光洒满了真理与伦理的大地，离开审美的诗意的阳光，真理的统治可能退化为教条的统治，伦理的规矩将陷入理教的虚伪。”

谢先生曾经在“北大批评家周末”的讨论中说：“一个严肃的、敬业的作家若是经受不了‘畅销’的诱惑，并以此为目的进行写作，无论如何意味着某种放弃。从长远看，是才华的自戕。”我一直觉得这是谢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化和中国文学现状分析得最独到和最负责任感的一句话，因为它带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体温。

我曾私下里称谢先生为谢老头儿和老顽童，我知道先生听了之后肯定会“非但不怒，反而喜形于色，觉得后生辈中尚能有如此知己，真是没有枉活”的感慨。

谢老头儿现在越来越忙了，甚至连写序的时间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读到他那些奇妙能飞的文字了。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我只在昌平园见过谢老头儿一面，“非正式会晤”，缺乏历史意义，但是我觉得一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后来我给谢老头儿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自己写了几首破诗，想请他指正一下。先生回答说：“我现在很忙。我不看诗。”第二次是接到《北大校刊》的采访任务，做一期“后朦胧”诗歌讨论。

先生回答说：“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研究诗歌了。你去找洪（子诚）先生吧，他对此造诣很深。”

讨论终于没有做成，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谢老头儿的参与，这个讨论是名存实亡的。所以，不讨论也罢。

此后，我再也没敢去打扰先生，怕影响他写序的情绪，直到现在。

谢先生讲课很精彩，以至于我第二次都不敢去听了，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运气——实际上，我此后确实也没有这运气了。

“他只给我们上了两次诗歌鉴赏课。听先生讲课真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课下递上自己的诗作，又向先生讨赐《诗探索》，先生极爽快地答应了。而今，先生所赠的两本《诗探索》还静静地伫立在书架上，先生的神韵也宛然在目。愿先生能永远年轻，面对如豆灯光，我默默祝福。”

1995年10月5日，当我给《北大校刊》写下了这段文字之后，我知道谢老头儿在我心中已经变成了一座永远的雕塑。

它的名字与北大一样，叫作永恒。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曾插队务农，后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先生致力于晚清——五四时期的变化中探讨现代中国小说史的源起。（北大中文系系刊《博雅》）

我一直认为，陈先生平原是与我们，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靠得最近的一位学者。这可能与他的年纪有关，也可能与他的人生阅历相近。

先生处在一个学者孤独如未名一水的时代，没有涟漪，甚至没有流动。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寂寞的先生站立在寂寞的地方，试图通过对西方冲击和传统内部力量的互动的论证，实现自己学者的人间情怀。也许（我深信不疑）若干年后，我们这

代人会因为学术上的平庸和失败而被先生和后人们遗忘，但是谁又能忘记这位浑身充溢着书生意气，渴望独立和纯粹的年长的老兄呢？

平原是个好名字，暗蕴着才华和正义感，也许陈先生也因此具有了一些好运气。战国四公子中，赵有赫赫大名的“平原君”；晋平原内史陆机，与弟陆云于大康末年入洛阳，文坛“大腕儿”张华叹其大才，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唐时于平原太守任上起兵抗叛的颜真卿也是一代大儒和大书法家……

在北大，至少在我们心目中，陈先生恐怕也已进入了大儒的行列。

“记得当初刚上陈平原先生的课时便为先生千古文人的儒雅风范所感动，后来听了先生半年课，读了先生的几本书后，更为先生的宽容和渊博深深折服。做着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先生，背负着重修小说史的辉煌的先生，你也许并不知道，一篇《萧瑟昌平路》令多少学生为你击节扼腕。”（拙作《我的昌平情结》）。

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们都渴望能够在许多张极其类似的面孔中突现自己的个性，希望能够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四年里不被人们忘记，所以我们或故作风雅，或标新立异，或以沉默作答生活。陈先生上课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而我就曾经扮演过这样一个可笑的角色。

那是陈先生的一堂课，我被他点名提问对梁实秋的看法，我说我对梁实秋不感兴趣；先生又问我对林语堂的看法，我说我对林语堂不感兴趣；先生又问周作人呢？我一看先生脸色不对，就只好胡说八道了一通，终于敷衍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周作人与林语堂可能是先生最喜欢的两个现代作家。我如此唐突大家，先生居然能忍下怒火，真是名士风采。

先生对武侠小说颇多感悟，尤喜金庸的《天龙八部》，对录像

《东方不败》亦很欣赏，奇书《千古文人侠客梦》纵横笔谈，海阔天空便是一证。

我手中存有先生所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卷，读序言至“就在彩云裂开的那一瞬间，我失去了尊敬的导师，也失去了慈爱的父亲，真正体会到了生死离别的悲苦。或许，没有真正遭遇爱情、没有直接面对死亡，都算不上成熟”处，必潜然而泪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世间之切肤悲痛，有大于此者乎？

人生是什么样子，当北大的象征意义大于她的学术地位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先生“人生事就是如此，在朝在野、局里局外，感觉和思维全都不一样”的慨叹。

钱理群 1939年3月生，浙江杭州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先生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命运和心灵历程，……二是文学史的理论 and 写作实践。（北大中文系系刊《博雅》）

在我看来，老钱是北大最后一位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现实主义者，最后一位能够将毕生精力掷于启蒙和开化中的知识分子。

他被以“革命”的名义发配到贵州并且在那里忍受16年的人生灾难，他在灾难中和灾难后对自我人格的剖析和批判，以及他生活中不断被挤压和撞击的遭际都无法使他再次像那些单纯、幼稚和真诚，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以“革命”的名义欺骗他们的小学生一样“低头认罪”。他宁肯再次倒下，也绝对不会屈从于学术、文化和人类终极关怀之外的压力。

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

究竟还剩下几个？

所以，在这样一个季节里，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老钱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和最敬爱的长者，尽管他很可能已经记不起我叫什么名字来了。

1996年春天，北航来北大请人办讲座，我推荐她们去请老钱。于是她们与老钱通了个电话，老钱答应了。讲座的头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老钱家，与老钱神侃了一通。记得老钱曾经对我们说了一句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在我看来，穆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的阅读习惯，使我在面对诗歌的时候能够产生或敬畏、或亲切、或激动、或感慨的心情来。

讲座那天晚上，气氛异常热烈，教室爆满（这是老钱讲座的一贯风格）。我站在教室外面，静静地品味鼓掌和笑声的意义，突然听到了一句很扎耳的话：

“鲁迅的心理有些畸形。”

我的心倏然一下收紧了，然后开始刺痛。那个伟大而近乎完美的神的形象难道真是如老钱所言？于是就认真听，最后同意了老钱的结论。

若干年之后，我也许会因为写诗作文章而赢得能够依靠卖往事赚点儿小钱的名气，那我可以明白无误的对自己、对任何人说：老钱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让我懂得了作为一个文人，我们应该摒弃造神的传统，脱离神迹，去创造，去叛逆和拯救，仅此而已。

据说老钱对学生特别好，视如己出。有一次，他的几个学生外出，回去得很晚，等走到门口的时候，才发现门口深深的夜色中伫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他那么矮矮胖胖地静静地站在那儿，就像朱自清先生站台送别的父亲一样。

这个“据说”来自于孔庆东先生给原北大中文系系刊《启明

星》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得非常精彩，我当时甚至能够背出其中的一些段落。现在却因为时间的无情，只能留下大意如此，具体细节，已经忘记，只剩下了慨叹和愧疚。如果有时间，我会去问一下吴晓东先生，他曾经是老钱的硕士生，很得老钱器重和疼爱。

老钱曾写了本书叫《周作人传》，非常漂亮，里面附了周的一首诗，曰：

燕山柳色正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这首诗作于北平沦陷前夕，读了老钱的书后，我和了知堂一诗：

燕京柳色着眼迷，不忍即舍一泪垂。

行人已不见炒栗，伤心岂独李和儿？

诗毕，忆及知堂旧事，遥想老钱风采，不禁悲哉！

呜呼，伤心又岂独李和儿一人耶？

韩毓海 1965年生于烟台。1991年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尝诲诸生“业患之不精，无患有司之不公”，务要“少吃酒、多读书”，可惜的是自己首先做不到。出版过两本书即《锁链上的花环》和《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今后的事情还不知道，只有走着瞧了。（韩毓海《摩登者说》切边介绍）

韩先生毓海也许不知道自己从出生的那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荒诞和荒谬的年代，这仿佛是一种宿命，让他在缺乏象征意义的生活之中四处游动着。

有时候觉得挺好玩儿：韩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是烟台人，我是莱州（烟台的一个辖县，汉时谓之东莱，是个小诸侯国）人；韩先生生于文革开始前一年，我生于文革结束那年，他整大我11岁；我的生日是11月5日，韩先生又大我一天……

这些很有意思的附会，也许像韩先生所附会的“陈独秀，字仲甫。生于1879年10月8日，安徽省安庆、怀宁两县的县界恰好从他出生的老屋中间穿过，这也许注定了他是一个一出生便将争议带入人间的人物”那样，同样令我自己感动。

所以我断言：韩先生的天空已经或者正在丧失，至少在面对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韩先生虽然可谓功成名就，但是他的青春小鸟，他最美好同时也最缺乏理性的浪漫岁月在一场场无谓的争执和挤压之后变成了一盘散沙。

这种结局对于谁来说都是悲哀的。

我想我这种断言不会激怒韩先生。他心中的怒火、恼火，以及文火和武火都已经被一场关于北大的不公正的讨论给溺杀了——水火难容，因此“溺”是一个姿态最优雅的动作，就像1998年夏天，我们将以同样优雅的动作与北大挥别一样。

时代愈是荒谬，就愈需要大知识分子出来救治。我的心底一直将韩先生视为一个大知识分子，觉得对于我们的生存境遇，他应当有一种关怀和怜悯，并且在关怀和怜悯之后能够以笔代矛，刺向生活的某个层面，或者仅仅做出一个刺的动作来。所以，1997年9月25日，我在他的《摩登者说》的扉页上写下了一行文字：“关怀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同时解剖他的灵魂。”若干年前，先驱者鲁迅曾经用“解剖”这个词救治了一代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还能用这个仁慈而充满血腥味儿的词来救治我们的时代和自我的灵魂吗？

一直很喜欢韩先生的文章，尽管他有时候在行文结构上落于粗糙和鄙陋；但是他的话语充溢着智慧，而智慧正是二十世纪末

我们所严重匮乏的东西之一。

《摩登者说》已经翻了无数遍，也找了几处“硬伤”出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也与“硬伤”同在：“陈凯歌呜呜咽咽地唱了三小时京剧国粹，紧追慢赶也还是没摸上‘奥斯卡’的屁股，最终又落个‘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现在能精辟如韩先生的人不多了。

我没有见过韩先生的面，至少目前。

吴晓东 黑龙江人，1991年获北大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对于自己最熟悉的老师，我却对他缺乏了解，这可能就寄寓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渴望进入城堡，却永远都无法找到城堡的入口，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一样；所以卡夫卡断言：“我们使劲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所必须依赖的。”

因为晓东先生讲授的小说诗学，我对卡夫卡产生了兴趣，同样也真正体味到了卡夫卡对于人生的论断：“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摧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如此”；“我知道，生活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带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把这种弱点当作我们时代的消极面紧紧地握在手里。”

在北大，你不得不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正因为这种痛苦的思考，北大才具有了自己的魅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痛苦的思考，先生才真正成为先生。

我记得刚到北大时，先生在一次班会上对我们讲：海明威曾经写道：

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